



博士文丛

第五辑

韩文奇 著

张耒及其诗歌创作研究



出版社



第一章 立于苏门的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张右史，又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祖籍亳州谯郡（今属安徽）。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三月，张耒出生于一个普通仕宦之家。其《上蔡侍郎书》自叙“家本淮南，仕者数世”（《张耒集》卷五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年版。下面引用的《张耒集》中的诗文，只注出卷数。），其《明道杂志》自叙“先人尝任三司检法官，以亲老求知吴江县”、“先君旧说，尝随侍祖父官闽”，但有关其家世资料很少，难以详考。有资料可考的是其外祖家。外祖父李宗易，字简夫，陈州（宛丘）人。庆历间，以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官至太常少卿，致仕后终老于陈。

张耒《投知己书》自称“自卯角而读书，十有三岁而好为文”，《宋史》本传称其“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因其外祖家在陈，故十七八岁游学陈州，得到时为陈州学官的苏辙赏识，遂得从苏轼游。熙宁五年（1072年）秋，应举姑苏，次年策名进士，弱冠之年开始步入仕途。

熙宁七年，张耒任临淮主簿。熙宁九年，丁父艰，寓山阳。居丧服满，元丰二年（1079年）秋，起任寿安尉。元丰六年，罢寿安尉，闲居洛

阳,同年又到陈州。元丰七年,任咸平丞。元丰八年末或元祐元年(1086年)初,曾任亳州教授,《宋史》失载此事^①。

元祐元年四月,张耒入为太学录。十一月试太学,迁秘书省正字。此时,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等皆居京城,秦观稍后也来京师,师友欢聚,宴饮雅集,诗文唱酬,极一时之胜。元祐五年六月,除著作佐郎,十二月加集贤校理。元祐六年六月罢著作佐郎,除秘书丞。十一月除著作郎,兼国史院检讨官。元祐八年冬,自著作郎除起居舍人。其时,宋哲宗亲政,新党执政,政局开始急剧变化,张耒被视为旧党中人受到弹劾,他难以在朝廷安身,遂以染病为由,请求外任地方官。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张耒以直龙图阁知润州,数月后坐党籍,解润州任。回京途中,忽被命守宣州。绍圣三年,罢守宣州,入京,除管勾明道宫。秋天,寓居宛丘。绍圣四年二月,张耒再坐党籍被削去直龙图阁官衔,贬监黄州酒税矾务,居黄近三年。元符二年(1099年)秋,又坐党籍,贬复州监酒。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向太后(神宗后)权同处分军国事,旧党中人遇赦,张耒于本年春被起为黄州通判,七月改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徽宗听政,召为太常少卿,任职仅一春,入夏,出守颍州。七月,苏轼病逝,张耒闻讣,在荐福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冬,出知汝州。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立元祐党人碑,张耒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七月,因给苏轼致哀事遭言官弹劾,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居黄近五年。崇宁五年,徽宗以彗星之变诏毁元祐党人碑,张耒于十一月离黄回淮阴居住。大观元年(1107年)居淮阴。大观二年暮春寓居陈州,此后一直在陈州闲居。大观四年诏监陈州之南岳庙,管勾崇福宫。政和四年(1114年)在陈州去世,归葬于淮阴。张耒的生平事迹,有近人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可参,故本文对此不再作长篇叙述。本章的重点是考论张耒同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秦

① 《张耒集》收有《赴亳州教官次韵和中书钱舍人及亳州守晁美叔见赠》一诗(卷十二)。又,张耒《与陈三书》说:“自少无所嗜,独知世间有文字之乐,长年以来谋衣食,逼忧患,耗失过半,今幸得闲官,俸禄可给,朝夕欲屏去百事,复其所志,进其所未能。履常虽奉太夫人于京师,而闻尊兄在侧,无乏养之忧。毫去都五驿,亦能为我一来同乐于寂寞之间耶?”(卷五十六)皆可证张耒曾任亳州教授。可参见本章第三节“张耒与晁补之的交游”中就此问题的考论。

观、晁补之、陈师道的交游。

苏轼继欧阳修为文坛领袖,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学集团,是为“苏门”。苏门文学集团成员众多,每个成员与苏轼的关系远近有别,因人而异,集团成员之间关系也有密有疏,迄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集团成员名单^①。王水照先生说:“‘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有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如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列从苏轼游者二十三人),对北宋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②张耒名列“四学士”之一,是苏门的骨干人物,在苏轼、苏辙及“六君子”中最后一个辞世^③。他和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的交游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意,透着精神品格的交融与磨砺。他在《赠李德载二首》其二说:“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蓂藻舒桃李,晁论峥嵘走金玉。六公文字满人间,君欲高飞附鸿鹄。”(卷十二)对六人作了生动而客观的评价。考察张耒和苏轼、苏辙及黄、秦、晁、陈等人的交游,对于全面深入了解他的生活和创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节 张耒与苏轼交游考论

张耒对苏轼执弟子之礼,自称“门人”。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①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程千帆《两宋文学史》、许总《宋诗史》、杨胜宽《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乐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对苏门文学集团成员问题都有所探讨,可参。

② 《论“苏门”的词评与词作》,《苏轼研究》,第22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秦观卒于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陈师道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师道卒于十一月,公元入1102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年),李廌卒于大观三年(1109年),晁补之卒于大观四年(1110年),苏辙卒于政和二年(1112年),张耒卒于政和四年(1114年)。

说：“某，苏先生门人之下列也。”（卷四十八）又《东坡书卷》说：“予与邠老皆苏学士徒也。”（卷五十四）。当然，苏轼没有设帐授徒，他与张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张耒欣然执弟子之礼，苏轼也乐意延揽“文人胜士”入其门下，故二人的师弟子关系也名实相符。不过，他们的交游又不仅仅是基于师弟子之谊，还有志趣相投的因素在。

一、张耒与苏轼的首次晤面与早期交往

张耒与苏轼交游始于何时何地，现存史籍及他们的诗文均无清晰准确的记载。有论者推断张耒于熙宁四年（1071年）面谒过苏轼，但对这个推断未做具体论证。如崔铭说：“从苏轼与张耒的生平行实来看，彼此第一次谋面当在熙宁四年。这年七月苏轼赴杭州通判任路过陈州看望乃弟，逗留到九月，其时张耒正‘游学于陈’，为苏辙所识。”^① 萧庆伟说：“苏轼出为杭州通判，途中与子由晤于陈。时耒仍居陈，当谒过苏轼。”^② 我们认为，苏轼与张耒熙宁四年会面与否，因缺少实证确实难以完全定论，目前还只能看作推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元丰八年（1085年）之前，他们曾经有过晤面。理由是苏轼于这年所作《答张文潜县丞书》说：“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③ 既云“久别思仰”，当是此前曾经见过面。苏轼在熙宁四年出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出为密州知州，熙宁九年移知河中府，未到任而改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改知湖州，同年被罗织罪状下御史台狱，贬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年），移汝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起知登州，旋以礼部郎中召还，迁起居舍人。张耒在熙宁五年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进士及第，寓居京师至仲夏，熙宁七年授临淮主簿，熙宁九年丁父艰，寓山阳，元丰二年（1079年）秋起任寿安尉，元丰六年罢寿安尉，居洛阳，同年又到陈州，元丰七年起任咸平丞。考察此间二人的行踪，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于某时同在某地，也没有发现他们有过晤

①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之关系》，《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

② 《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苏轼文集》，第495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面。只有熙宁四年张耒“游学于陈”时,苏轼为看望苏辙在陈逗留数月,故这一年张耒面谒苏轼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此,熙宁四年张耒面谒过苏轼的推断当可成立。《宋史·张耒传》说:“(耒)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宋史》卷四四四)从这段话可知,张耒“游学于陈”得“学官苏辙”赏识,因苏辙而得“从轼游”。张耒面谒苏轼恐怕还是苏辙引荐的,这次会面可看作耒、轼交游的起始点。

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次年秋作《后杞菊赋》^①,一方面表达了对朝廷新法过分削减公使钱的不满,另一方面表达了齐物思想与超脱精神。张耒《杞菊赋》小序说:“予到官之明年,以事之东海,道涟水,涟水令盛侨以苏子瞻先生《后杞菊赋》示予。予不达世事,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亲老矣,家苦贫,冀斗升之粟以纾其朝夕之急。然到官岁余,困于往来拜走之费,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叹嗟,自以为无聊,既读《后杞菊赋》而后洞然。如先生者犹如是,则予而后可以无叹也。”(卷一)张耒于熙宁七年授临淮主簿,此赋作于熙宁八年。序中讲“既读《后杞菊赋》而后洞然”,可见苏轼此赋对他触动很大。他在赋中称颂苏轼“世为达者”、“先生哲人”,见出对苏轼的仰慕之情、追随之意。

苏轼是否看到了张耒的《杞菊赋》,未见记载,有论者认为苏轼看到了张耒《杞菊赋》,且颇为欣赏。如崔铭说:“海州与密州相距不远,张耒这篇《杞菊赋》显然很快传到了苏轼手中。……苏轼命张耒为超然台作赋,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这位青年才士的高度赏识,颇有‘自屈辈行’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将其引入文坛,与当今第一流的文学之士同逞笔力,而这正意味着苏轼已将张耒视为自己的门下之士。”^②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断。这种推断或许不无道理,但说此时“苏轼已将张耒视为自己的门下之士”,则不能令人信服。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苏轼在密州,因城上旧台稍加修葺,作为游观之所,苏辙名之曰“超然”。苏轼作

① 孔凡礼说:“秋,轼作《后杞菊赋》,感叹斋厨索然,以示涟水令盛侨,侨以示张耒,耒作《菊赋》赞苏轼。”见《三苏年谱》,第84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之关系》,《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

《超然台记》，表示了超脱、达观、“无所往而不乐”之意。苏辙作《超然台赋并叙》，也表达了超脱、达观、求乐之意。张耒受命作《超然台赋》，他说：“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卷二）可见苏轼约请了张耒为其所修超然台作赋。张耒在赋的小序提出“超然者之贤”的观点，赋中主要表达了超脱、达观之意。这说明张耒与苏轼（包括苏辙）有相似的精神追求，因为志趣相投，二人就越走越近，也由于得到苏轼的赏爱，张耒的追随之意就越来越强烈了。基于此，我们认为苏轼请张耒作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张耒引为同调、知音，而不是“已将张耒视为自己的门下之士”。自此时起，二人正式开始了文字交往，关系渐趋密切。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改知湖州，张耒《寄答参寥五首》其二说：“苏公守吴兴，山水方有主。子兮从之游，挂锡当可驻。尘埃困孤鹤，念子久失所。秋风展其羽，道使万里去。青云引高唳，爽绝谁敢伍？予驹欲西秣，东我江海橹。平生二三子，往往在南土。子才得所乐，我拙日益鲁。拳拳相思心，契阔不得语。”（卷九）此“相思”“契阔”之情不独对参寥发，恐怕更多的是对苏轼发。《寄答参寥五首》其五说：“子从吴兴公，乃独获所欲。得意有知赏，幽怀免穷独。嗟予失所投，痛学自藏覆。”“吴兴公”指苏轼。张耒对苏轼的称颂、追慕之意可谓溢于言表。有此敬慕之情和追随之意才能发出“嗟予失所投”、“悲予独契阔，不得陪酬康”（《寄答参寥五首》其三）的叹息。元丰五年，苏轼正谪居黄州，作《答李昭玘书》说：“（轼）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①这是苏轼首次并提黄、晁、秦、张四人，虽不能一定要说苏轼已把四人视为门人^②，但苏轼颇欣喜于四人为自己“独先知之”则无疑，又以包括黄、晁、秦、张四人在内的“文人胜士”为己所“获”、与己同道而自得^③。

① 《苏轼文集》，第417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② 黄庭坚初拜苏轼，当在元祐初。其《跋子瞻木山诗》说：“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宋史》卷三八《苏轼传》：“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贤自予也。”此说有理。苏轼虽乐意奖掖后进，但不以师自居。

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苏轼除起居舍人,张耒约于次年春作《寄子瞻舍人二首》以贺,其一说:“皎皎连城璧,实为天地珍。足伤曾不售,宝气终氤氲。山川媚余秀,星斗揽奇氛。终然不可掩,三欲被埃尘。天王斋戒受,严庭具九宾。贮之黄金台,藉以九龙茵。事称忘礼厚,人谁骇其新。车轮走四方,争睹快一陈。无瑕故易伤,剑辉志乃神。”(卷七)以“无瑕”的“连城璧”喻苏轼,为苏轼的被起用而歌呼。又修书致意^①,并呈送了自己所作诗文,苏轼有《答张文潜县丞书》寄给张耒。信中感叹张耒之文似苏辙,“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致使“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表达了斯文相付之意:“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②至此,可以说张耒和苏轼师弟子关系已经明确。

综上所述,熙宁四年张耒当面谒过苏轼,这是他们交游的起始点。熙宁八年,张耒作《杞菊赋》,初次表达了对苏轼的仰慕之情和追随之意。次年,苏轼约请张耒为其所修超然台作赋,不仅仅是赏识其才,同时是视为同调、知音。由于得到苏轼的赏爱,张耒的追随之意愈发强烈,二人正式开始了文字交往,关系渐趋密切。元丰年间,张耒对苏轼的敬慕、追随之意已趋坚定。苏轼为包括黄、晁、秦、张四人在内的“文人胜士”为己所“获”、与己同道而自得,张耒为苏轼的被起用而歌呼。到元丰八年,苏轼向张耒表达了斯文相付之意,张耒和苏轼师弟子关系已经明确。

二、张耒与苏轼元祐时期的交游

元祐元年(1086年)初夏,张耒至京师为太学录。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说:“四月,供职太学。……诏执政大臣各举文学政事行谊之臣,可充馆阁之选者,范纯仁以先生荐。”(《张耒集》附录一,下文不再注

① 《张耒集》未收,此信当已佚。

② 《苏轼文集》,第495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出)六月,张耒等九人参加学士院考试,以充馆阁,主考官为苏轼^①。张耒以弟子身份拜谒苏轼,据现存资料的记载,要到这年的十一月份:十一月十九日,张耒与黄庭坚、晁补之一同拜访过苏轼。苏轼《书黄泥坂词后》曰:“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甚喜,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②这是有确切记载的张耒和苏轼最早的一次会面。稍后,苏轼作《武昌西山》,张耒有《次韵苏公武昌西山》(卷十五)。元祐期间,张耒一直在京担任馆职,苏轼回朝任职也有数年,二人过从较多,关系密切。我们看到,除了熙宁四年张耒和苏轼的初次见面,在元祐前后的漫长岁月里二人一直悬隔两地,未能相见,只是元祐年间二人都居京师时,时相往来,留下了一些美好的交游片段。

徐度《却扫编》(卷下)说:“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寤,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妥,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功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③孔凡礼先生说:元祐二年二月,“朝廷命撰富弼神道碑”。引《却扫编》卷下此条记载,并指出“今本作‘敢’”^④。此事可见二人交谊之真挚。本年六月,“轼与张耒(文潜)至王直方(立之)家,读耒所作诗,深爱之。”^⑤此事载《王直方诗话》:“文潜先与周翰、公择辈来饮余家,作长句。后数十日,再同东坡来。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盖其间有‘漱井消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第8条有记载。

② 《苏轼文集》,第761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③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45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④ 《三苏年谱》,第180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⑤ 《三苏年谱》,第183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午醉，扫花坐晚凉’、‘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之句也。”^① 本年，张耒作有《读苏子瞻韩干马图诗》与《再和马图》，有“我虽不见韩干马，一读公诗如见者”、“想图思画忽有感，况复慷慨吟公诗”之句（卷十四）。张耒作《谢钱穆父惠高丽扇诗》，苏轼有《和张耒高丽松扇》：“可怜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宫。万牛不来难自献，裁作团团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诗集里。犹胜汉宫悲婕妤，网虫不见乘鸾子。”^② 这是苏集中唯一一首和张耒的诗。另外特别要提及本年间的一次西园聚会：苏轼、苏辙、李公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等十六人某日会于驸马都尉王晋卿的西园，张耒出席了这次以苏门中人为主体的文人雅士们的大型聚会。此次西园雅集为人乐道，传为美谈。米芾《宝晋英光集》补遗《西园雅集图记》说：“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雾，草木花竹，皆绝妙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貌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手秉焦箆而熟观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首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鬪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湲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新，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

①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5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苏轼诗集》，第152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有十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辩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揽者，不独图画之可传，亦足仿佛其人耳。”这篇记生动反映了元祐年间以苏门中人为主体的文人雅士们的聚会交游情况，颇具典型性。

元祐三年春，苏轼知贡举，辟张耒为参详官。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引王明清《挥麈后录》：“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挟呈东坡公：‘此文甚佳。’盖以东坡《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也。”并指出“黄鲁直《太学题名记》漏载先生名”。据孔凡礼先生《三苏年谱》，本年九月，张耒曾探视卧病的苏轼；十月，苏轼作《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①，张耒和以《次韵苏内相好头赤》（卷十六）。在本年，苏轼曾赞张耒所画马为“妙墨”，张耒与苏轼同观晁补之所藏画野马^②。元祐四年，苏轼“尝与黄庭坚、张耒等会，饮龙团茶，作律赋”^③。

元祐期间，张耒有《与大苏二简》论史。苏轼曾与张耒、晁补之论词，事见《王直方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④苏轼又曾与张耒论诗。张耒《明道杂志》说：“子瞻说：读（韩）吏部古诗，凡七言，则觉上六字为韵设，五言则上四字为韵设，如‘君不强起时难更’、‘持一念万漏’之类是也。不若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于诗，诚未臻其极也。”（《丛书集成》初编本）又说：“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九云‘初日头’，问其义，但云‘若此僧负暄于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岂有用“白”对“天”乎？’余异日问苏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同上）佚名《道山清话》说：“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

① 参孔凡礼《三苏年谱》，第1941、19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孔凡礼《三苏年谱》，第1971、197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孔凡礼《三苏年谱》，第200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5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燭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去失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会也。坐皆绝倒。”^①由此可见师弟子间谈诗论文、情意融洽之交谊大端。

元祐八年八月，苏轼妻王闰之卒，张耒有祭文^②。同年十月，苏轼出知定州，张耒出席饯行宴会。《三苏年谱》引《济南先生师友谈记》说：“东坡帅定武，诸馆职饯于惠济。坡举白浮欧阳叔弼陈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饮此酒，酒醕当言所罚。’三君饮竟。东坡曰：‘三君为主司而失李方叔，兹可罚也。’三君者无以为言，惭谢而已。张文潜舍人在坐，辄举白浮东坡先生曰：‘先生亦当饮此。’东坡曰：‘何也？’文潜曰：‘先生昔知举而遗之，与三君之罚均也。’举坐大笑。”^③张耒与苏轼的和谐关系于此可见。李之仪应苏轼之召赴定州为签判，张耒作《送李端叔赴定州序》说：“苏先生守定武，士愿从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请以端叔佐幕府。苏先生之位，未能进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苏先生门人之下列也，其亲慕端叔不足怪。”（卷四十八）这段话虽为李之仪而发，却透着对苏轼的景仰之情，同时，这是张耒首次明确自称为苏轼“门人”。苏轼在定州得雪浪石，名其室曰“雪浪斋”，张耒作《和定州端明雪浪斋》诗，有“东坡先生事业异，道歧不得安修门。眼前富贵念不起，惟有山林劳梦魂”之句（卷十四）。是年一别，二人遂天各一方，直到苏轼去世，再未谋面。随着党争的加剧、政局的多变，苏轼自绍圣元年（1094年）被一贬再贬，

①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9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苏门中人只有苏辙与张耒作了祭文。张耒祭文题为《祭苏端明郡君文》。

③ 孔凡礼说：《永乐大典》卷一万二千四十四引《北窗丛录》转引李廌《老叹》自跋，亦叙此事，文略同。“三君为主司”云云，或指本年开封秋试。（《三苏年谱》，第2500～250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张耒亦受到牵连,被列入党籍,也连续遭贬,但二人师徒子的深挚情谊始终未变。

总之,元祐年间是张耒与苏轼交往最多的时期,张耒抱着对苏轼的景仰之情追随左右,师弟子间谈诗论文、宴饮雅集,关系融洽,情意真切。

三、张耒与苏轼的后期交往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惠州,张耒遣兵王告、顾成奉事苏轼于路途。绍圣二年,张耒又遣兵王告到惠州问安,苏轼送张耒桃榔方杖一枚,并作《桃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父九疑也》诗以通情谊。绍圣三年春,张耒又派专人至惠州探望苏轼,苏轼有答简^①。自己虽无法亲往致意,派专人跋山涉水请安问好,可见张耒对苏轼情意的深切。

元符元年(1098年)三月,苏轼书张耒论治眼、治齿语于琼州开元寺壁。元符三年秋,苏轼移廉州安置,与李之仪简,关切询问张耒境况:“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各得信否?文潜旧疾,必已痊愈乎?”^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终得北归,张耒闻讯喜甚,作《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间毒烈计已误。柯山潘子应鼓舞,与子异时从杖屨。”(卷十五)召友人同“鼓舞”,愿与师再相聚,然此愿竟成永远的遗憾。不久苏轼病逝,张耒闻讯甚悲,出已俸于荐福禅院饭僧缟素而哭,由此又被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孔凡礼先生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五月庚戌纪事:朝散郎管勾明道宫张耒在颍州闻苏轼身亡,出已俸于荐福禅院饭僧缟素而哭。耒以此于同年七月二十二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见《宋会要辑稿》第九十九册《职官》六七之三

① 参孔凡礼《三苏年谱》,第2583、2657、269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之仪第六简。参孔凡礼《三苏年谱》,第2797、290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九。”^①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说：“先生时知颖，闻讣出俸，于荐福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又说：崇宁元年（1102年），“先生复坐党籍落职，主管亳州明道宫。七月，言者谓先生知颖日，闻子瞻卒，饭僧缟素而哭。遂自管勾亳州明道宫，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此后，张耒一直用诗文反复表达对苏轼的景仰追思之情，如《和归去来词》、《寓陈杂诗十首》其六、《题东坡卜算子后》（卷十六）、《昔苏先生〈游庐山〉诗云“平日怀真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有庐山”辄继一首》（卷二十六）、《昔苏先生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何事春山里，人人识故侯”辄继其后》（同上）等。《和归去来词》小序称苏辙示以苏轼所作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词》及其本人之作，“命之同赋”，他“自悯其仕之不偶，又以吊东坡先生之亡，终有以自广”，遂有是作。赋中说：“归去来兮，吾悲夫斯人不返兮，岂招仙圣为之游。昔惠我以好音，忽还去而莫求。”（卷五）《寓陈杂诗十首》其六说：“兴哀东坡公，将掩菴山墓。不能往一恸，名义真负有。可能金玉骨，亦遂黄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终飞去。”（卷八）声情并茂，掷地有声。可以说，深怀着对苏轼深沉的敬爱之情，张耒走完了他晚年的人生旅程。

第二节 张耒与苏辙交游考论

张耒对苏辙也执弟子之礼，其《寄子由先生》说：“先生四十犹不遇，独坐南都谁与语。青衫弟子天下穷，饥走京尘困羁旅。”（卷十四）《寄子由二首》其一说：“门人白首侯芭在，眷恋微官愧昔贤。”（卷二十二）自称“弟子”、“门人”。张耒是苏辙任陈州教授时的门生，他们的交游基于师弟子之谊，同时也有志趣相投的因素在。

张耒始从苏辙游的年龄现有十七、十八岁两说。《宋史·张耒传》说：“（耒）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论者多据此断定熙宁三年（1070

^① 《三苏年谱》，第30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年)张耒十七岁时从苏辙游。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曾枣庄《苏辙年谱》、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等均持此说。孔凡礼先生说:“据《年谱》,李宗易乃耒之外祖父。耒来陈乃由于此。《栾城集》卷九有《次韵张耒见寄》诗云:‘相逢十年惊我老。’次韵作于元丰三年,逆推可知文潜从游始于今年。”^①有学者提出了“十八岁说”,所持理由是:第一,《张耒传》说“十七时作《函关赋》”,“十七”是作《函关赋》的年龄,并未包括“游学于陈”一事。第二,古人诗中常举成数,苏辙“相逢十年”之说未必精确^②。如张耒《寄余五十五》:“念昔登科各年少,君中第一名传呼。……当时意气今在否,十年我困官庭趋。”诗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距张耒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及第未及十年,即举成数。第三,元丰元年,张耒赴寿安尉途中曾到南都拜望苏辙,离南都时作《惜别赠子中昆仲二首》,其二云:“我年十八从先生,今也相逢得三子。坐思前事且十年,嗟我不才老将俟。”“先生”指苏辙。明确说年十八师从苏辙,时为熙宁四年(1071年)。张耒《与鲁直书》亦云:“仆年十八九时,居陈学。”由此断定,张耒“游学于陈”在熙宁四年至五年间^③。此说言之成理,自成一家。只是我们觉得能佐证“十七岁说”的还有张耒的《初离陈寄孙户曹兄弟》诗,诗中说:“三年流落寓于陈,一命青衫淮水滨。”(卷二十六)谓在陈三年。张耒熙宁五年秋应举姑苏,是年十九岁,此前寓陈三年,故其十七岁始从苏辙游的说法似不能轻易否定。

张耒在陈游学约两三个年头。熙宁五年,张耒与苏辙别于宛丘,直到元丰元年(1078年)才得以相见,这期间二人未留下交往的记录。张耒《寄子由先生》及《再寄》二诗作于元丰元年,这年秋与苏辙在汴上相聚一日。《寄子由先生》说“先生四十犹不遇”,元丰元年苏辙四十岁;《再寄》说“宛丘之别今五年,汴上相聚才一日”(卷十四),二人宛丘之别

① 《三苏年谱》,第30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苏辙《次韵张耒见寄》:“相逢十年惊我老,双鬓萧萧似秋草。”(《苏辙集》,第16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 崔铭《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之关系》,《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

在熙宁五年,五年后是元丰元年。《寄子由先生》说:“先生四十犹不遇,独坐南都谁与语。青衫弟子天下穷,饥走京尘困羁旅。高门得饭暂见肉,敝筐无实惟巢鼠。……平生不解谒贵人,况乃令严门者居。此生自料应常尔,但愿流年醉中度。又思人世乐乃已,此外纷纷何足数。”一方面说先生(苏辙)“不遇”,一方面说自己“天下穷”、“困羁旅”,感慨很深。《再寄》说:“宛丘之别今五年,汴上留连才一日。残生漂泊客东南,忧患侵袭心苦失。先生神貌独宛然,但觉岩岩瘦而实。有如霜露入秋山,扫除繁蔚峰峦出。自言近读养生书,颇学仙人饵芝术。披寻图诀得茯苓,云是松间千岁物。屑而为食可不饥,功成在久非仓卒。上侔金石免毒裂,下比草木为强崛。涓涓漱纳百玉津,炼以真元纳之骨。神仙自是人不知,岂为难求废其术。我闻公说心独嗟,欲问太虚穷恍惚。奈何不使被金朱,乃俾枯槁思岩窟。又观世事不可常,倚伏谁能定于一?终生轩冕亦何赖,况有朝升而暮黜。何如端坐养形骸,寿考康宁无夭屈。乃知岂即非良图,却笑儿曹嗜糠粃。青衫弟子昔受经,赋分羁穷少伦匹。自知无命作公卿,颇也有心穷老佛。但思饱暖愿即已,妄意功名心实不。终期策杖从公游,更乞灵丸救衰疾。”(卷十四)述苏辙所言“仙人饵芝术”,表达了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看法,表示“终朝策杖从公游,更乞灵丸救衰疾”的心愿。这两首诗反映了他们诚厚的师弟子之谊。

元丰二年,张耒自山阳赴寿安尉任,过南京,作《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诗中慨叹:“汤汤长河水,赴海无还期。苍苍柏与松,岗原长不移。览物若有叹,谁者知我心。口吟新诗章,手抚白玉琴。鸣琴感我情,一奏涕泪零。子期久已死,何人为我听?”(卷九)感物伤怀,颇多郁结,渴望向师友一诉情怀。苏辙和以《次韵答张耒》:“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须自为计,水当为我移。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乐事,手付瑟与琴。夜吟感秋时,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听。”^①开导张耒顺应自然,修身养性,自得其乐。苏辙作《登南城有感示文务光王通秀才》抒忧伤之情:“幽忧随秋至,秋去忧未已。城南试登望,百草枯且死。落叶投入怀,惊鸿四面起。所思不可

① 《苏辙集》,第165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见，欲往将安至。……网罗一张设，投足遂无寄。”^①反映出处境恶劣，竟至无所措手足。孔凡礼先生说：“所思谓轼也。适与其兄适，临城人。轼知徐，适兄弟来学。轼往湖，适兄弟从。轼就逮，适兄弟来南京。”^②张耒作《和登城依子由韵》劝慰苏辙：“人生随大钧，命不贷君子。付之无如何，外垢资内洗。……举头苍天高，叹此青云士。酌公芳尊酒，愿公百忧止。”（卷九）请其宽释愁结。张耒离南京，赴寿安，苏辙作《次王适韵送张耒赴寿安尉二首》，其一说：“绿发惊秋半欲黄，官居无处觅林塘。浮生已是尘劳侣，病眼犹便锦绣章。羞见故人梁苑废，梦寻归路蜀山长。怜君顾我情依旧，竹性萧疏未受霜。”^③表达归隐之思，感念张耒“顾我情依旧”，“竹性未受霜”。张耒作诗寄苏辙（此诗已佚），苏辙答以《次韵张耒见寄》：“此身长似伏辕马，何日还为纵壑鱼。怜君与我同一手，微官肮脏羞牛后。请看插版趋府门，何似曲肱眠瓮牖。……县前女几翠欲滴，吏稀人少无晨集。到官惟有懒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湿。”^④表示希望过“纵壑鱼”那样的生活，教导张耒为官“懒相宜”。总的来看，元丰二年在南京的这组赠答诗突出表现了张耒和苏辙师弟子间的深厚情意。

南京一别又是数年音讯不通，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苏辙除秘书省校书郎，张耒时任咸平丞，闻讯作《闻苏先生除校书郎喜而为诗并招王子中》，以秋鹤喻苏辙，赞鹤不啄腥膻，藐视燕雀：“绩溪仙翁若秋鹤，有喙不向腥膻啄。几年戢翼大江南，下看纷纷飞燕雀。亲携杖拂呵禅祖，自伐松根出灵药。世人真自为公忙，公宁有意人间乐。”（卷十六）为乃师几年戢翼，终得高飞而欢欣鼓舞，表达了对苏辙的敬爱之情。

元祐年间，张耒和苏辙都居京城，平时当有一些来往，但就现存资料来看，张耒大多是追随苏轼参加一些活动，几乎没有和苏辙单独聚会。究其原因，主要是苏轼以其文坛领袖之巨大人格魅力令天下文士

① 《苏辙集》，第16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三苏年谱》，第11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苏辙集》，第165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苏辙集》，第16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